

旧版文章

天人古今

- 古今通论
- 古代通论
- 世界史论
- 当代三农
- 现实问题
- 旁通类鉴

先秦史论

- 先秦通论
- 原始经济
- 文明起源
- 夏商西周
- 春秋战国

汉唐史论

- 汉唐通论
- 战国秦汉
- 秦国秦代
- 西汉东汉
- 魏晋南北朝
- 隋唐五代

宋元史论

- 宋元通论
- 唐宋通论
- 北宋南宋
- 辽金西夏
- 蒙元史论

明清史论

- 明清通论
- 明代通论
- 明中后期
- 清代通论
- 清代前期

近代史论

- 近代通论
- 清代晚期
- 民国通论
- 民国初年
- 国民政府
- 红色区域

现代史论

- 近世通论
- 现代通论
- 前十七年
- 文革时期
- 改革开放

学科春秋

- 学科发展
- 专题述评
- 年度述评
- 学人学术
- 学者小档

理论方法

- 史观史法

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 / 近代史论 / 近代通论 / 农业、农村、农民 / 高阳模式：中国近代乡村工业化的模式之一

高阳模式：中国近代乡村工业化的模式之一

2006-01-16 冯小红 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4期 点击: 624

高阳模式：中国近代乡村工业化的模式之一

高阳模式：中国近代乡村工业化的模式之一

冯小红

(复旦大学历史系200433)

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4期

内容提要：从清末至抗战爆发前将近4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高阳织布业创造了作为中国乡村工业化模式之一的“高阳模式”。具体而言，“高阳模式”是一种以大城市为依托，以农村为基地，以改造传统产业为出发点，以家庭工业和小工厂起步，以培养新型工商人才为持续动力，面向市场的区域专业化的乡村工业化模式。它对于中国的乡村工业化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高阳模式 乡村工业化

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工业异军突起，成为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一大亮点，并形成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典型发展模式。而在近代中国农村，也有少数区域曾经踏上工业化历程，并形成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总结和提炼这些模式，不仅是史学研究题中应有之意，而且可以为今天中国的乡村工业化提供借鉴。笔者要研究的高阳织布区便是近代乡村工业化最为典型的区域之一。

高阳织布区位于华北平原中部。它兴起于高阳县城及其周边区域，以后逐渐扩展至高阳县全境和蠡县、清苑、安新、任邱等县的一部分。据吴知统计，1932年高阳织布区东西长90余华里，南北宽50余华里，包括村庄414个，人口434 510人。①因为高阳县城为该区域的纱、布集散中心，所以习惯上称之为高阳织布区，所产布匹通称高阳土布。

20世纪初，从引进铁轮机和机纱开始，高阳织布业踏上工业化历程，②以后虽历经挫折与反复，但总体上一直保持着上升趋势。到1928年，高阳织布区成为拥有铁轮机25 575台、提花机4 056台，年产改良土布500余万匹的巨大的乡村工业区。③自清末至抗战爆发前将近40年的发展历程中，高阳织布业创造了作为中国乡村工业化模式之一的“高阳模式”。④

①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页。

②工业化的根本特征是由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笔者把高阳织布业中铁轮机和新型提花机替代传统手工织机的过程作为工业化历程，是吸收了史建云的研究成果(见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60页)。

③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第18页。

④费孝通认为发展模式的意义是指“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路子”(费孝通：《学术自述与反思》，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44页)。以此意义衡量，高阳织布业的发展道路完全可以构成一种“模式”。

一、以大城市为依托

| |
|------|
| 历史理论 |
| 领域视野 |
| 方法手段 |
| 规范学风 |
| 史料索引 |
| 古今文献 |
| 考古文物 |
| 简帛文书 |
| 回忆追述 |
| 社会调查 |
| 论著索引 |
| 论著评介 |
| 通论文集 |
| 古代史著 |
| 明清史著 |
| 近代史著 |
| 现代史著 |
| 动态信息 |
| 期刊集刊 |
| 网站网刊 |
| 团体机构 |
| 学术会议 |
| 研究动向 |
| 他山之石 |
| 世坛综考 |
| 美国史坛 |
| 西欧史坛 |
| 东亚史坛 |
| 其他地区 |
| 池月山云 |
| 文史随笔 |
| 知识小品 |
| 诗词诗话 |
| 文艺点评 |
| 小说演义 |
| 史眼世心 |

首先，天津直隶工艺总局对先进织布工艺的倡导，为高阳织布业的兴起提供了契机。1903年，直督袁世凯委周学熙在天津创建了直隶工艺总局，从日本引进各种织机，并聘日本技师为教习，传习先进织布技艺。高阳旅津人士李长生等人从家乡选出3名擅织土布的农民来津学习，并从天津日商洋行购买数台铁轮机，在高阳县城创办了一家小型织布厂。后来，由于织布厂不景气，“遂决定遣散工徒，各回本村，自相传习”。①高阳商会在1908年前后也派人往天津学习铁轮机的织造技术，并“购买数架(铁轮机)，劝导织户均改用铁轮机，研究添织各样土布”。②《周止庵先生别传》中称：“经高阳李氏派人来实习工厂实习机织……返乡之后逐年推广，遂造成河北省高阳县之巨大工业”。③

其次，高阳织布业所用棉纱和人造丝都来自中国大城市的机器纺纱业或进口，原料产地以日本和本国的上海、天津、青岛等地为主，购买地主要在天津。所用机器设备最初购自于天津的田村、佐佐木等日商洋行，后来，天津三条石的民族机器制造业兴起，郭天成、郭天利等民族机器制造厂都以出产织机而著称，由于其物美价廉，高阳客商就多转向这些民族机器制造厂购买织机。

再次，大城市的商业和金融业为高阳布线商人提供了周转资金。美国经济学家纳克斯认为资本稀缺是影响不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关键。④高阳的钱粮业在清光绪后半期(约1890—1908年)虽然积累了一定的资本，66家商号经营的借贷资本额达18万余元，每家的流动资金自12 500元至75 000元不等，⑤但是这与织布业迅速发展所需的巨额资金仍相去甚远。高阳的布线商人有时也得到本地“堂子号款”的接济，⑥但该款的数量一般较少，只能用来应急。高阳的几十家布线庄以少至几千元，多不过数万元的资本，经营十数万元乃至数十万元的布线生意，究其根底，在他们最耗资金购买原料的环节上多得天津棉纱商号和银号相助。1921年以前，国内纱厂勃兴，买卖棉纱获利优厚。天津的棉纱商号多从各纱厂赊购棉纱，再赊售给高阳布线庄，而且赊售时不计利息。待布线生意周转一个循环后，高阳商人再将售布所得现款汇往天津偿欠。当时高阳土布销路极佳，且利润丰厚，高阳商人偿欠的信誉很好。即便是一时难以归还欠款，天津棉纱商也多不追究。只要能在年底结清欠款，高阳布线庄就可以在下一年继续赊购棉纱。因此，这一时期高阳商人实质上等于借着天津商业界的巨款来周转。1921年以后，纱价步跌，买卖棉纱每包不过获薄利数元。天津的棉纱商号不再赊帐售纱。是时，高阳布线庄又逐渐与天津的银号建立了借贷关系。他们在天津购买棉纱时，由银号垫付一部分或全部货款，待其在外埠售布得款后，再汇往天津还贷。因此，这一时期高阳商人是靠天津金融界的贷款来周转。可以说，天津商业界和金融界的这种支持是高阳织布业起步并持续发展的关键。

总之，大城市不仅为高阳织布业提供了发展契机以及原料、设备，而且提供了必要的周转资金。如果没有天津这样一个通商大埠作为依托，高阳织布业恐怕不会如此顺利而迅速地踏上工业化道路。

①李长生：《论中国宜用人力机器纺纱》，《大公报》(天津)1910年5月24日。

②《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22页。

③《近代史资料》总第74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3页。

④刘再兴等编：《区域经济理论与方法》，中国物价出版社1996年版，第46页。

⑤毕相辉：《高阳及宝坻两个棉织区在河北乡村棉织工业上之地位》，方显廷编：《中国经济研究》下册，商务印书馆(长沙)1938年版，第671页。

⑥“堂子号款”是高阳织布区的一种定期信用借款，多来源于乡间的地主和富农。

二、以农村为基地，以改造传统产业为出发点，以家庭工业和小工厂起步

在当时国内外已有大机器进入纺织业的情况下，高阳人改造传统织布业时，却选择了一种特殊的方式。这种特殊方式包含以下两方面内容：其一，不是直接引进最先进的动力机器，而是首先引进以人工为动力的铁轮机和提花机；其二，在生产组织形式上，不是采用机器大工厂的形式，而是对应于所引进的不同种类的机器分

别采用包买制和小工厂这两种不同的生产组织形式。高阳人之所以采用这种特殊方式，其原因主要在于：

第一，高阳的传统织布业相当发达，农民对传统手工织布技艺掌握得很熟练。铁轮机的操作方法与高阳原来所用投梭机相类似，因此，当地农民对于使用洋纱和铁轮机引起的技术革新能迅速适应。

第二，引进动力机器以及建立大工厂须有电力设施做能源基础，而当时的农村能源基础设施十分落后。若现建火力发电厂，不仅需时久，与高阳新兴商业资本迅速发展织布业的要求相背，而且耗资巨大，回报期长，按效益最大化原则，商人一般是不会予以投资的。而当时的政府财政，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应付日常开支尚且左支右绌，更遑论投资建发电厂了。因此，在当时的农村，普及动力织机和建立机器大工业有其不现实之处。

第三，对铁轮机和机纱，高阳商人广泛采用“撒机制”的生产组织形式。在这种形式下，商人把铁轮机赊售给农民，并把机纱分发到农民家中进行生产，在回收布匹时付给农民手工费，机价从手工费中扣除。从实质上看，“撒机制”是一种典型的包买主制度。“撒机制”的兴起，是由于它被当地商会及其商人作为迅速推广铁轮机和机纱的一种手段。当时每台铁轮机售价约银洋50元，每机正常运转至少需经、纬线各3捆，每捆重10磅，按平均价格计算，约需制钱1万文。^①普通农民无力负担。为迅速推广铁轮机和机纱，高阳商会及其商人乃采取“撒机制”的生产组织形式。

后来“撒机制”在高阳织布区的长期流行则由于它是在以铁轮机为主要生产设备的条件下，能够与国内外大机器织布业相抗衡的最佳组织形式。当时一台普通动力织机售价约630元，一台铁轮机售价约50元，二者的资本投入比为13：1。而以普通动力织机织造14磅粗布，平均每机每8小时可出布125尺，以铁轮机织造14磅粗布，平均每机每11小时可出布120尺，^②二者的产出比为1.33：1。因此，在当时的技术和市场条件下，相比较而言，铁轮机对于资金短缺的高阳商人来说具有更大的资本边际效应，包买制是实现这种较大资本边际效应的最佳组织形式。因为农村劳动力的价格偏低，包买制下的家庭劳动根本不计劳动力成本，其边际报酬甚至可以降到必要劳动价值以下。1932年织8斤白布(宽2尺5寸，长100尺)的平均工资为每匹0.819元，^③假定一家织户只有一台织机，每天可出布100尺，这0.819元便是该织户一天的平均工资。而织布工序，除一人专事上机织布外，其余家人须分担浆纱、络经、络纬、整经等工作。如果一家有四、五口人，则几乎每人都需要参加机房里的工作。将这0.819元平均分到每个人头上，所得就极其微薄了。因为机会成本

^①方显廷：《华北乡村织布工业与商人雇主制度》(一)，《政治经济学报》第3卷第4期，1935年7月，第755页。

^②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267页。

^③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第127页。

几乎等于零，所以对于织户来说，挣多挣少无所谓，能挣总比不挣强。布线庄正是利用农村织户的这种心理，尽可能地压低织布工资，最大限度地降低生产成本，从而降低产品的销售价格。1911年前后，高阳土布之所以能够在华北市场上战胜英国粗布，就是由于其售价每匹低于英国布0.9两银。^①

第四，对提花机和人造丝，高阳人主要采取小工厂的生产组织形式。1914年前后，新型提花机被引入高阳，但直到1926年，天津纺织界发明的人造丝浆经法传入高阳后才得以迅速普及。提花机和人造丝的推广，使高阳土布在产品形态上又增加了明华葛、绸、缎、罗、纺、绉、麻纱等畅销一时的新品种。提花机的生产效率比铁轮机还要低(提花机每机每11小时工作日可出提花布30尺；铁轮机每机每11小时工作日可出布80到120尺)，按常理推论，本不该出现小工厂的组织形式。但是，提花机的操作和维修技术较为复杂，对织工的要求较高，比较适宜于集中进行经营管理。更为主要的原因是高阳琳琅满目的人造丝提花布在全国罕有其匹，多数产品属于首创，初兴之时，获利极其丰厚，而且供不应求。所以，提花布的生产主要考虑的不是降低成本，而是如何提高效率。小工厂的组织形式使各个工序之间初步实现了分工合作，生产效率比家庭生产提高了很多，因而成为对应于提花机的主要生产组织形式。

总而言之，这种特殊方式既便于改造后的织布业在农村扎根，又有可观的经济效

益，因而是一种适合当时农村实际情况的产业改造方案。但这不等于说高阳人习于落后。这种特殊的改造方式只不过是一个过渡而已。到抗战前夕，同和、永升、福利永等几家工厂已开始使用最先进的动力织机，并且其生产组织形式具备了机器大工业的特征。一如果按正常轨道发展下去，高阳织布区很可能会成为中国的纺织工业中心之一，如今天的高阳县使然。只可惜高阳织布业正常的发展道路被日本侵华战争所打断。

三、以培养新型工商人才为持续发展的动力

新型工商人才的培养，既是高阳织布业工业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促进工商业持续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

高阳商会的建立者们认识到“商业人才之培养尤不可缓”，^②因此，在商会成立后不久即创立商业夜校。夜校“以各商家学徒为学生，聘公正士绅为教习”，^③属短期培训性质。1907年，商会集资“修建讲堂五间，教习宿舍三间”，^④将夜校正式改为初等预科学校。

商会对商学极为重视，1908—1909年间就扩充商学事六次开会集议。1909年2月，全体会员议准：“商业学校，原本商家随时捐助，由义务而成，自应竭力提倡，培养人才。凡肄业学生，概不收学费，以资鼓舞”。^⑤这项免费就读的决议，减轻了学生的经济负担，拓宽了学校的招生范围。

初等预科学校学制本为四年，到1910年，40名学生修业已逾三年，考其成绩，多达高等小学程度，“殊多可造之才”，^⑥并且年龄正合上中等学校。于是，庆丰义领事杨焕文等联名向商会投递说帖，倡议仿照京师第一中学之成例，将原校扩展为中等商业学堂。商会议决后呈文天津商务总会并上呈农工商部，1910年2月得部批准。新校正式定名为高阳甲种商业学校。

① 日本调查局编：《通商汇编纂》第45号，明治44年(1911年)。转引自顾琳(日)《技术转让与晚清河北的农村工业》，叶显恩主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上册，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91页。

② 李晓冷等编：《高阳县志》第2卷，1933年。

③ 李晓冷等编：《高阳县志》第2卷，1933年。

④ 《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第220页。

⑤ 《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第222页。

⑥ 《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第231页。

新校被批准成立后，准备在原有学员的基础上“添招商界子弟，足额百名”。^①这样以来，原有校舍已不敷使用。商会便购得位于县城东街的冯家大院，建筑新校舍。修建新校所需巨款由各商号随时捐助。为解决学校的日常经费，商会开会议决，各商家所收布匹“每土布一匹，认捐京钱六文”，^②即以此款项作为学校的日常经费。

甲种商业学校订有完备的章程，管理较为正规。学校设监督一员，总理全校事物；设监学两员，由教师兼任，负责学生纪律；设庶务及会计各一员，主管后勤及财务工作。学生分预科和本科两种，学制均为三年。所设课程包括商品学、经济学、商业簿记、商事法规、中国文学、外国语、商业道德、商业实践、体操等，既突出商学特点，又兼顾基础知识，并且德、智、体、用全面考虑，充分体现了经济发展对新型工商人才的要求。

民国以后，因招生规模扩大，商会又在县城南门外选定新址，对学校再次进行扩建。后因连年战争，“校内驻兵，学生星散，门窗什器悉付军人焚火，商教遂以中缀”。^③1928年初，商会对学校进行了修复和整顿，并改校名为私立职业学校。时值高阳织布业第二次高潮期，条格布、麻布盛极一时，印染业方兴未艾，织染方面的专业人才缺乏，因此，学校在课程设置上进行了调整，在删减原科目的同时，又增加了提花机操作与维修、印花、染轧等应用学科。此外，学校还自行编印了有关高阳织布业发展演变历史的讲义。

从1907年到抗战前夕，高阳商会办学前后共计20余年，培养人才数百名。另外，还有不少有志青年到外地更高级的学校去深造，如：苏秉杰、李恩波、李相波毕业于天津高等工业学校。^④这些有较高文化素质并掌握了新型工商业知识的人才

投身于工商业实践之中，为高阳织布业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他们的作用从同和工厂的发展中可见一斑。

同和工厂始建于1921年。该厂初建时占地15亩，拥有提花机32张，在高阳织布工厂中并不突出。但到“七七事变”前夕，同和成为拥有南、北两厂，固定资产25万元，流动资金十数万元，织染轧兼备，产供销一体的大型织染综合企业，堪称高阳织布企业的龙头。同和工厂在短短十数年间之所以发展如此迅速，新型工商人才所起作用至关重要。总经理苏秉璋毕业于高阳甲种商业学校。与传统工商业者相比，他思想解放，易于接受新事物，勇于破除陈规陋习。他用现代管理知识管理工厂，并大力引进新设备和人才。1935年10月，应李石曾之邀，苏秉璋与高阳私立职业学校校长李福田南下苏皖考察实业，归来后写成《江南实业参观记》一书，提出兴修高保铁路、建大型火力发电厂以及发展大机器纺织业的设想，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副总经理兼总设计师苏秉杰毕业于天津高等工业学校染织设计科。在他的主持下，同和产品的花样格式不断翻新，始终保持着强劲的市场竞争力。李相波从天津高等工业学校毕业后，受聘于同和，担任北厂经理。在他的技术指导下，经北厂染轧的布匹，颜色纯正均匀，光泽度强。此外，苏秉璋还特聘由日本留学归来的高阳私立职业学校教师田

①《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第235页。

②《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第232页。

③李晓冷等编：《高阳县志》第2卷，1933年。

④李恩波：高阳县城东街人，高阳织布区最大的印染企业恩记工厂经理。李恩波的情况来自崔国谨口述资料(1985年)。李相波：同和北厂经理。李相波的情况来自苏秉琪口述资料(1991年)。

哲培为顾问。工厂各科的负责人大都是高阳私立职业学校的毕业生，而且在人事安排上还基本做到了专业对口。①这样，从上到下，同和工厂实现了管理人员的知识化和专业化。这种合理的高素质的职员结构为同和工厂的迅速崛起奠定了基础。

许多经过正规教育的新型工商人才，经过实践的锤炼，成为高阳工商界的后起之秀，如：同和工厂经理苏秉璋、恩记工厂经理李恩波、本生和布线庄经理韩相奎等。②他们的加盟，给高阳工商界注入新鲜血液，提高了当地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整体素质。

四、面向市场的区域专业化经济发展战略

进入工业化历程的高阳织布业是完全面向市场的。1920年以前，高阳出品以改良棉白布为大宗。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洋布进口量下降，加之国内其他地方又鲜有出产者，高阳土布市场销路极佳，高阳织布业首次达到高潮。1920年以后，洋布卷土重来，同时又有山东潍县棉白布的竞争，高阳棉白布的销量急剧下降。面对变化了的形势，高阳人求新求变，先后开发出条格布、人造丝提花布等新产品，经过几年努力，到1928年前后高阳织布业再次达到高潮。在此次高潮中，高阳土布的销售网络遍及河北、河南、山西、山东、绥远、察哈尔、东三省、湖北、江苏、安徽、湖南、江西、福建、广东、陕西、甘肃、新疆等国内20余省区，并远及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③高阳的布线庄是以销定产的，“布商运销各省随销随定，如销额多少，则产额亦然”。④正是高阳人这种强烈的市场意识，才使得高阳织布业经受住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经济衰退的考验。到1936年前后，随着全国经济形势有所好转，高阳人又迅速抓住市场契机掀起了高阳织布业的第三次高潮。在第三次高潮中，各布线庄在衰落时期纷纷撤消的售货外庄大都予以恢复，同时还在西南的西藏、云南、贵州等省开辟了新市场。⑤可以说，完全面向市场是高阳织布业历久不衰的主要原因。

经过20余年的发展，在20世纪20年代末，高阳织布区变成了一个布匹织造与染轧深加工一体的、产供销一条龙的专业化的商品布生产区域。著名的经济学家马尔说过，在这种区域，“行业的秘密已不成其为秘密了，而是像以往一样到处流传，孩子们在不知不觉中耳濡目染。出色的工艺自然出类拔萃，而工具、工艺和生产组织管理方面的发明和改革的长处不胫而走。……尽管投入这一行业的单笔资本都不大，但在大规模生产同类产品的地区，有时仍获得很高水平”。⑥高阳织布区

正是马歇尔所说的这种经济区域，达到了区域规模经济效应。

综上所述，高阳织布业在工业化历程中创造的“高阳模式”是一种以大城市为依托，以农村为基地，以改造传统产业为出发点，以家庭工业和小工厂起步，以培养新型工商人才为持续动力，面向市场的区域专业化的乡村工业化模式。

“高阳模式”对中国的乡村工业化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①苏秉琪口述资料(1991年)。

②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第233页。

③韩相奎的情况来自他本人的口述资料(1995年)。

④《农商部咨各地方长官文》，《政府公报》第478号，1917年5月11日，第18—20页。

⑤丁世洵：《1934年至1949年的高阳织布业》，《南开学报》1981年第1期。

⑥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1986年第8版，第225页。

首先，乡村工业化必须因地制宜，选择适当的产业。中国农村不但人口众多，人均耕地严重不足，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而且人口的平均文化素质偏低。因此，在启动乡村工业化时，应该首先选择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待工业化达到一定水平后，再寻求产业升级或转型。此外，最好能利用本地传统产业，走传统产业改造的道路。这样以来，传统技艺既可以得到充分利用，改造后的产业又易于在农村扎根。今天河北省的许多著名乡村工业，如高阳的纺织业、辛集的皮毛业，就是在改造传统产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其次，持续的乡村工业化必须形成一定规模的专业化生产区域。也就是说，只有在一定区域内形成某种产业或几种相关产业的专业化生产，才有可能保持乡村工业的持续发展。这种专业化生产区域，除马歇尔所阐明的规模经济效应外，还有一种地名品牌效应。当人们提到某个地名时，马上会联想到某种产品；同样，当人们提到某种产品时，马上会联想到某个地名。这样以来，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将会更大更持久。区域规模经济效应作用于内，地名品牌效应作用于外，共同给予乡村工业持续发展的动力。相反，如果区域过小或产业过杂，乡村工业化的势头都难以保持下去。

再次，乡村工业化必须充分利用城市的资源，走城乡一体工业化道路。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在经济领域必然呈现出城市现代产业与农村传统产业并存的二元结构。农村可以发挥自身原料丰富、劳动力价格低廉等优势，通过各种方式与城市携手，充分利用城市的资金、技术、设备和人才资源发展乡村工业，形成二元优势互补格局，走城乡一体工业化道路。

责任编辑: echo

[发表评论](#)

[查看评论](#)

[加入收藏](#)

[Email给朋友](#)

[打印本文](#)

平均得分 0, 共 0 人评分

如果你想对该文章评分, 请先[登陆](#), 如果你仍未注册, 请点击[注册链接](#)注册成为本站会员.

1 2 3 4 5 6 7 8 9 10